

# 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

段 渝

[摘要] 历史文献记载的蜀身毒道,即今学术界通称的南方丝绸之路,是史籍所载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一系列史实表明,最早从中国进入印度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是蜀人,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丝绸等蜀物到印度而引起了丝绸的传播,由丝绸的传播而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进而从一个重要方面沟通了中国与欧亚各古代文明的交流和互动。

[关键词] 蜀身毒道; 中印交通; 古蜀丝绸; 南方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2014)01-144-05

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sup>①</sup>,是史籍所载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这条中西交通线路,历史上称之为“蜀身毒道”,学术界又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古代四川所产的蜀布、丝绸及邛竹杖等“蜀物”,西输印度,播至中亚,因而使成(都)之名得以在印度出现并广为流传。本文对此略作论述,就教于海内外博学通人。

## 一、蜀身毒道的开通

蜀人商贾从事长途贸易直至印度的情况,历代文献都有记载。《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详细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做的西行报告,其中明确指出“臣(张骞)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大夏(今阿富汗)商人所得蜀布、邛竹杖,是他们在身毒“得蜀贾人市”,而这些“蜀物”是由蜀人商贾“往市之身毒”。这些史料显然说明,蜀身毒道贸易是由蜀人商贾直接从蜀地前往印度从事的远程贸易,而不是所谓间接的转手买卖。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然闻其西(指昆明族之西——引者)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

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亦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近,其大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滇越(即盘越)的所在,张星娘以为是孟加拉;向达以为是剽越,即《广志》所谓剽越,地在今缅甸;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sup>(1)</sup>、饶宗颐等以为应在阿萨姆与缅甸之间;汶江《滇越考》则认为在今东印度阿萨姆,即迦摩缕波<sup>(2)</sup>。考之史实,汶江的意见应是符合文献记载的。可见,蜀人商贾是通过东印度陆路通道从阿萨姆进入印度地区的,这也是蜀、印之间进行直接贸易的重要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后、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焚、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滇是蜀出西南夷地区西贾印度的必经之地,位于云南中部。僰即汉之僰道,在四川南部的宜宾与云南东北昭通之间,这是先秦、秦汉时期五尺道的所在。邛在今四川凉山,笮在四川雅安、汉源、盐源等地,为古代牦牛道(或称灵关道)的所在。五尺道和

① 见《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汉书》亦有相同记载,可参看。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编号: 10&ZD087)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3-10-30

[作者简介] 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史、巴蜀文化、南方丝绸之路。四川成都 610066。

牦牛道是从成都南行进入西南夷地区的两条重要通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其间早有交通存在。这些史籍不仅说明了蜀人在西南夷地区进行商业活动的史迹，而且还清楚地记载了从蜀地进入西南夷地区的路线，即通过牦牛道（西路）和五尺道（东路）分别南下至滇，殊途而同归。

西南夷地区自古富产铜、锡矿石，不仅中原王朝需要从云南输入铜、锡矿料，而且蜀地青铜器原料也须部分仰给于云南，如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铜，即取之于云南<sup>(3)</sup>，其锡、铅原料的供应也离不开这条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也可以证实这个问题。

云南、四川西南和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出土大量贝币，表明两地均有以海贝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习俗。将川、滇古道上所出贝币的地点连接起来，正是由四川进入云南的西南夷道和蜀身毒道<sup>(4)</sup>。可见蜀与西南夷的深厚历史关系，从政治影响到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诸方面，几乎无处不在。

把上述诸证结合起来，清楚地反映了蜀人商贾经西南夷地区进入緬、印进行远程贸易的斑斑史迹。从蜀人南贾滇僊（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滇濮”）、僊僊，西近邛、笮，“取其笮马、僊僊、髦牛”<sup>(5)</sup>，到蜀人商贾出没于东印度阿萨姆之滇越，再到中亚阿富汗北部大夏商人所卖蜀布、邛竹杖，乃是“往市之身毒”，“得蜀贾人市”，而张骞在中央亚细亚之大夏（今阿富汗）所见唯一的中国产品便是蜀布等“蜀物”。这一系列史实，一方面表明最早进入印度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是蜀人，另一方面也表明印度地区最早所认识的中国是蜀。对此，还可以从“支那”名称的内涵得到具体说明。

“支那”（Cina）是古代印度地区对中国的称呼，最初见于梵文，出现年代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但支那名称指的是中国哪个地域，并不明确，历来译者只是将支那翻译为中国，但并没有对支那名称所指的具体地域予以还原。研究成果表明，关于“支那”的确切地域指向，不应为秦国、楚国，而应该是成都。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Candragupta, 320 - 315 B. C. 在位）大臣 Kautilya（Visnuqupta, Canakya 僊抵厘耶）在《政事论》中提到 Cinapatta，意思是“支那生产的成捆的丝”。既然梵语 Cina 这个词还原为成都，那么 Cinapatta 显然就是指产自成都的成捆的丝绸，而被蜀人商贾贩运至印度<sup>(6)</sup>。

古蜀文明从商代以来就同印度地区存在经济文

化交流，这就为古蜀名称远播于印度提供了条件。据《史记》和《汉书》，蜀人商贾很早就“南贾滇、僊僊”，并进一步到达“滇越”从事贸易，远至身毒销售蜀布、邛竹杖等蜀物。滇越，即今印度阿萨姆地区，身毒即印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古籍《政事论》也提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所说蚕丝和织皮纽带恰是蜀地的特产。表明了战国时期蜀人在印度频繁的贸易活动，而这又是同商代以来三星堆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流一绪相承的。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印度必然会对古蜀产生较之中国其他地区更多的印象和认识。

成都这个名称产生很早，已见于《山海经》，春秋时期的四川荣经曾家沟漆器上还刻有“成造”（成都制造）的烙印戳记。“成”这个字，过去学者按中原中心论模式，用北方话来复原它的古音，以为是耕部禅纽字。但是，从南方语音来考虑，它却是真部从纽字，读音正是“支”。按照西方语言的双音节来读，也就读作“支那”。这表明，支那其实是成都的对音。

梵语里的 Cina，在古伊朗语、波斯语、粟特语以及古希腊语里的相对字，均与“成”的古音相同，证实 Cina 的确是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他地区的相对字则均与成都的转生语 Cina 同源。而其他诸种语言里支那一词的相对字都从梵语 Cina 转生而去，也恰同成都丝绸经印度播至其他西方文明区的传播方向一致。由此可知，支那一词源出成都，是应有的结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揭示出成都平原在早期中西交通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证明了古蜀丝绸的西传史实。把这一事实同印度僊抵厘耶《政事论》所载“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相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支那，即指成都；所谓 cinapatta，即是成都生产的丝绸，中、印的记载原来都是出自一源的。丝绸、布匹、织皮、邛竹杖都是蜀地原产<sup>(1)</sup>，不论张骞在大夏所见从印度转手贩运的蜀布、邛竹杖，还是印度《政事论》所记支那的丝和织皮，都是由蜀贾人贩至印度出售的。因此，印度得以称成都为支那，并非偶然。

进一步看，印度最早所认识的支那，必然是印、支之间有路可通，有丝可贾的地方。而在中国，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地区只有蜀，而且支那这个词主要流行的地域是印度和东南亚，至若西方载籍中的 seres 等，则是由 Cina 一词派生转译而来<sup>(7)</sup>，也表明它与中国西南有关，与西南文化之重心所在的蜀之成都有关。

① 蜀产织皮，见《禹贡》“梁州”，参考《说文》“紕”、“絍”等条。

以此再联系印度洋北部地区和东南亚自古存在以贝币为交易媒介的传统习俗，而云南各地和三星堆所出海贝中的环纹货币大多数产于印度洋，以及三星堆文化中明显的印度洋和南亚文化因素集结等来看，蜀与南中、蜀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关系很早以来就已发生，其滥觞至少在商代中晚期，约公元前13、14世纪上下<sup>⑧</sup>，延至支那名称初见于印度载籍的时候，其间关系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所以，印度称成都为支那，并不是偶然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有“身毒之民”，又说“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也”，后一句固属有误，然而也可见蜀与印度（身毒）确实具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而居于西南夷永昌地区的身毒之民，自然也会是将蜀之物产及声名播于印度的另一条渠道。可见，由蜀经云南至印度的蜀身毒道，从商代以来迄于汉世一直是开通的，张骞在中亚所闻，仅是其中的某些片断而已。

古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空间分布十分广阔，《华阳国志·蜀志》记述道“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在蜀的西南外即汉代所谓西南夷之地，古称南中，“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sup>⑨</sup>，分布着大量濮越人的群落。《史记·大宛列传》正义说“昆、郎等州皆滇国也。其西南滇越、越嵩则通号越，细分则有嵩、滇等名也。”可见蜀地“南接于越”，即与南中之地包括永昌以西南滇越等夷越直接相连。这正是蒙文通先生所说包括汉之益州、永昌、越嵩等在内的蜀之南中。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条件下，通过蜀人商贾直接贩运蜀丝、蜀布等蜀物到印度的同时，关于这些物品的产地之名必然也会随之流布于印度。换言之，印度在接触到蜀丝、蜀布等物品时，对这些物品来源地的认识 and 了解，只可能是蜀，而不会是其他任何地方。

西南夷长期受蜀文化播染以及蜀身毒道贸易长期为蜀所控制的情况，充分证明印度古文献所最早记载的支那是指古代成都，这也与西方学者关于“支那是一个若干世纪以前的王国名称，这个王国控制着大陆与印度的商道和丝绸贸易”的看法<sup>①</sup>，不谋而合。

## 二、古蜀丝绸与汉通西域前的南方丝绸之路

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sup>②</sup>，公元前四、五世纪时，丝绸在欧洲尤其罗马帝国盛行。至汉武帝时，汉王朝才开通西域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末），远远晚于中国丝绸西传欧洲的年代。

先秦时，位于西方的秦国不产丝绸，秦人一向被蜀人笑讽为“东方牧犊儿”<sup>⑩</sup>，就是说秦人主要从事畜牧，工商不多。秦国历史上向来重农抑商，商鞅变法后，更是变本加厉。虽然，战国晚期秦惠王为拉拢义渠，曾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sup>⑪</sup>，但这“文绣千纯”应是蜀国所产的蜀绣。秦、蜀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sup>⑫</sup>，其中必然包括原产于蜀国而声明远扬的蜀绣。严峻的秦法绝不允许商人大批买卖丝绸和丝织品，史籍中也未见秦国大规模地从其他地区进口丝绸，再经由西北边疆民族转手卖给西方的记载。考古学上，至今并没有出土秦国丝绸的事实，也是一个明确的证据。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张骞出西域西行，沿途在西域各国均有所见闻，知道西域各国国君“贪汉缯絮”，却并没有提到和听说过秦国出产的丝绸。这说明在汉王开通西域以前，西域各国即使知道中国丝绸，他们能够得到的丝绸也少得可怜，所以张骞特别强调说西域各国国君“贪汉缯絮”。可见当时中国丝绸的西传，在西域沿线并不多，丝绸主要不是经由西域传往中亚和西亚地区的。

由此看来，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通西域道以前，中国丝绸的西传，其线路应当是沿蜀身毒道西行而去。考古学家曾在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的一座堡垒内发现大量中国丝绸，据研究，这批丝绸是经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转运到中亚的蜀国丝绸<sup>⑬</sup>。喀布尔正当南方丝绸之路要道，这批丝绸出现在那里不是偶然的。联系到史籍关于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竹杖等“蜀物”，是大夏人“往市之身毒（印度）”，并在身毒“得蜀贾人市”等记载，足证很早就有蜀人商贾前往印度从事长途贸易的史实，而丝绸的西传，自然也离不开这条古道和往来活跃在这条古道上的蜀人商贾。

古蜀丝绸素称发达，从它的蚕桑起源之早这个角度便足可见其一斑。蜀王蚕丛氏在虞夏之际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起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周时代，蜀地的丝绸业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内出土的一尊青铜大立人像，身着内外三重衣衫，外衣长及小腿，胸襟和后背有异形龙纹和各种花纹。学术界认为，青铜大立人像

① D. D. Kosamb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P. 202, 此据饶宗颐《蜀布与 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交通》所引原著（英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1974年。

② Philippa Scott, The Book of Silk,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3, p. 78. 又见《新华文摘》1993年第11期关于奥地利考古队在埃及发掘中发现中国丝织品遗物的报道。

头戴的花冠，身着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表明其冠、服为蜀锦和蜀绣<sup>[14]</sup>，这是有道理的。西周前期，渭水上游宝鸡附近分布着一支弓鱼氏族类，其大量遗物已被发掘出来<sup>[15]</sup>。从各种文化现象分析，弓鱼氏文化是古蜀人沿嘉陵江向北发展的一支，是古蜀国在渭水上游的一个拓殖点<sup>[16]</sup>。在弓鱼氏墓葬内，发现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丝织品有斜纹显花的菱形图案的绮，有用辫绣针法织成的刺绣，这些丝织品其实就是古蜀丝绸和蜀绣，它们出土于以丝织著称的蜀人墓中，不是偶然的。

春秋战国时代，蜀地的丝绸业持续发展，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据专家研究，均属古代蜀国的产品<sup>[17]</sup>，并与四川炉霍卡莎石棺葬内发现的织品相似<sup>[18]</sup>，均为1.2经二重夹纬（含心纬）1/1平纹，或1:1经重夹纬1/1平纹，经密36×3根/厘米，或56×2根/厘米。蜀锦色彩丰富，图案纹饰优美绮丽，多数可见于元人费著《蜀锦谱》，足见源远流长。蜀绣品种较多，图案多以神话为主题，花纹单位较大，呈二方或四方连续，绣法以辫绣为主，这些也都是后来蜀绣的特点，亦足见其源远流长。西汉扬雄《蜀都赋》所谓“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对蜀锦极尽赞美之词，是有充分根据的，一点也不过分。

由于巴蜀丝绸质量优良，产量亦大，所以从很早起就充当了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沿丝绸之路输送到印度和西方，对印度和西方文明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方丝绸之路是巴蜀丝绸输往南亚、中亚并进一步输往西方的最早线路。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sup>[19]</sup>，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即在这个时期见于广汉三星堆蜀文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仿海洋生物青铜雕像也由此而来<sup>[20]</sup>。印度所最早知道的中国，梵语名称作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就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sup>[21]</sup>。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Seres、Thinai等，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

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说明了古蜀丝绸对西方的巨大影响，和古蜀丝绸在中西交流中的积极作用。

汉代和以后出西域西行中亚、西亚并抵东罗马安都奥克（Antioch，当即《魏略·西戎传》中的安谷城）的西域丝绸之路，其国际贸易中的物品相当多数是丝绸，而丝绸中的主要品种，便是出产于蜀的丝绸，其中大量的是蜀锦。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先后出土大批织锦<sup>[22]</sup>，均为蜀锦<sup>[23]</sup>，其年代从南北朝到唐代均有，确切表明蜀锦是西域丝绸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也是经由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主要中国丝绸。因此，唐代吐鲁番文书中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等蜀锦名目，并标有上、中、下三等价格<sup>[24]</sup>，就不是偶然的，充分表明了蜀锦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蜀锦、蜀绣不但分别沿南、北丝绸之路传播到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区，而且还在战国时代向北通过北方草原地区传播到北亚，这条线路便是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学上，在俄罗斯阿尔泰山乌拉干河畔的巴泽雷克（Pazyryk）古墓群内（约公元前5—前3世纪）<sup>[25]</sup>，出土不少西伯利亚斯基泰文化的织物和中国的丝织品，丝织品中有大量的捻股细线织成的普通的平纹织物，还有以红绿两种纬线斜纹显花的织锦，和一块绣着凤凰连卷图案的刺绣。刺绣图案与长沙楚墓出土的刺绣图案极为相似，有学者据此认为是楚国刺绣。其实，楚地织锦和刺绣素不发达，战国和汉代楚地的丝织品均仰给于蜀，长沙楚墓出土的织锦和刺绣均为蜀地所产，并非楚地的产品。因此，巴泽雷克墓内出土的织锦和刺绣，必定就是蜀锦和蜀绣。由此可见，最早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输送到北亚地区的中国丝绸，是蜀地所产丝绸，而草原丝绸之路也是由此命名的，表明古蜀丝绸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与北亚地区文化交流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古蜀丝绸在欧亚大陆的传播，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并由丝绸的传播而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从一个重要方面沟通了中国与欧亚各古代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不仅对于中国认识世界和世界认识中国，而且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和西方古典文明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而卓越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沙畹. 魏略·西戎传笺注 (A). 冯承钧编译.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 (C). 商务印书馆, 1962. 41-57.
- (2) 汶江. 滇越考 (J). 中华文史论丛, 1980, (2).
- (3) 金正耀, 等. 广汉三星堆遗址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 (J). 文物, 1995, (2).

- (4) 段渝. 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 (J). 东南文化, 1993, (2).
- (5) 史记·西南夷列传 (Z). 四库全书本.
- (6) 段渝. 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 (A). 四川大学历史系. 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 (C).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126-162.
- (7) 段渝. 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 (J). 历史研究, 2009, (1).
- (8) 段渝. 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 (J). 社会科学研究, 1993, (3).
- (9) 华阳国志·南中志 (Z). 刘琳校注. 巴蜀书社, 1984, 333.
- (10) 华阳国志·蜀志 (Z). 刘琳校注. 巴蜀书社, 1984, 188.
- (11) 史记·犀首传 (Z).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史记·货殖列传 (Z).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童恩正. 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 (J). 成都文物, 1989, (2).
- (14) 陈显丹. 论蜀绣蜀锦的起源 (J). 四川文物, 1992, (3).
- (15) 卢连成, 胡智生. 宝鸡弓鱼国墓地 (M). 文物出版社, 1988.
- (16) 屈小强, 李殿元, 段渝. 三星堆文化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601-602.
- (17) 武敏. 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 (J). 文物, 1984, (6).
-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 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 (J). 考古学报, 1991, (2).
- (19) 段渝. 略谈南方丝绸之路 (J). 光明日报, 1993-05-24.
- (20) 段渝. 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 (J.) 社会科学研究, 1993, (3).
- (21) 段渝. 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 (A). 四川大学历史系. 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 (C).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126-162.
- (22) 新疆出土文物图录 (M). 文物出版社, 1975.
- (23) 武敏. 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 (J). 文物, 1984, (6).
- (24)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 大谷文书 (Z). 3097、3066号.
- (25) 〔俄〕鲁金科. 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 (J). 考古学报, 1957, (2).

(责任编辑: 赵荣华)